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意义*

（一九七九年一月六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在这以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意义非常重大。这两个会议的文件，按照中央的规定，将陆续传达、布置学习。今天，我要讲的，是就这两个会议的文件的主要精神，按照我的体会提出几个最重要的问题，给大家在学习时参考。

许多同志都说，很多年没有召开这样的会议了。这两次会议恢复了我党历史上的优良传统，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大家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展开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两次会议反映了我们党在政治上的一个伟大进步，说明我们党经过林彪“四人帮”十多年的打击破坏以后，恢复了自己的光荣传统，重新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所规定的工作方法，党内的民主制度，来进行工作。这种工作精神和工作方法，三中全会要求把它扩大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间去，永远坚持下去。而且，这两次会议还解决了党的历史上、党的生活里、国家的生活里很多年

* 此篇是 1979 年 1 月 6 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全院大会上的报告。标题是收入《胡乔木文集》第 2 卷时加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来没有解决的问题。所以,这两次会议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开得非常好,受到全党的热烈拥护,受到全国人民的热列拥护。

现在我想从三个方面讲讲这两次会议的意义。一、这两次会议,决定了党的工作中心的转变;二、这两次会议回顾、总结了我们党在三十年中间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三、会议回顾、总结了党在建国以来,特别是二十年来,主要是一九六六年以来的许多根本的问题,重大的历史问题,总结了党的生活的历史经验,这两次会议既然在这三个方面进行了这样深入的得到重要结果的讨论,在党的历史上就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都着重地首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全党从一九七九年开始,要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就是说,一九七七年、一九七八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揭批林彪、"四人帮"这样一个政治大革命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了它的任务。尽管有一些地区、部门在这个方面遗留的问题还不少,还需要有一段时间继续解决没有解决的问题,但是就全国范围说来,这个任务在绝大部分地区、部门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了。因此,党就能够把工作中心转移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样一个主要任务方面来。

我们党提出在一九七九年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这并不是说在历史上我们没有提出过这个转变,没有开始这个转变。在历史上已经提出过,而且已经开始。我们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从来认为,我们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一直到将来条件成熟时,转入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我们党的根本纲领、根本任务。在几十年中间,我们奋斗牺牲、前赴后继,根本目的就是这个。我们不是为革命而革命,不是为阶级

斗争而阶级斗争。革命、革命战争,这不是我们的目的,这是我们为了达到目的所必须采取的方法。我们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也不是我们的根本目的,它也是一个方法,一个手段,目的还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来提高全体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最后达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个理想。还在革命战争中间,在有了根据地以后,我们就开始经济建设。那个时候的经济建设,一方面是为了战争的需要,是为了革命的需要,一方面又是要解决人民生活里的迫切问题。可是,在革命战争中进行建设,要受到许多限制,当时我们同敌人进行着生死斗争,不可能把经济建设作为我们全部工作的中心。当我们夺取了全国政权以后，这个任务马上就提到我们面前。毛主席在一九四九年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已经规定,占领了城市就马上要把生产建设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党的其他工作都要围绕这个中心,而不要乱碰乱撞,妨碍、贻误这个中心。以后,在一九五三年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首先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同时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已经包括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个内容，而这个内容是放在三大改造的前面。正因为是这样,毛主席才能够在一九五六年对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做出总结,提出《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在作《论十大关系》报告的时候,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已经基本完成。一九五七年夏天,发生了右派进攻和我们对右派的反击，毛主席后来把它表述成为思想战线、政治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到一九五八年,毛主席提出把技术革命作为党的中心任务，并且在同年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所有这一切都是说,党中央早已把着重点的转移、工作中心的转变提到议事日程上,并且做

出了规定,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公报里面说,在毛主席、周总理的领导下，为建设社会主义经济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正是这些工作，奠定了我们现在在新的条件下实行工作着重点的转移的物质基础，同时也给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六年期间,党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发生了一些曲折。这是大家所知道的。这些曲折并没有使得我们离开这一工作中心，只是我们在工作方法上有一些失误,有一些差错。从那以后,党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我们整个国民经济很快得到了恢复，到一九六六年已经超过了历史上已经达到的水平。

一九六六年以后,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毛主席提出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可是一开始就受到林彪“四人帮”的疯狂破坏。虽然周恩来同志、陶铸同志及其他许多同志跟林彪“四人帮”做了坚决的斗争,但是这个方针终究没有能够得到认真的执行,因为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太厉害了。在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三年这段时间，国民经济在党中央、各级党委、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共同努力下,有过一段上升。可是到了一九七四年,“四人帮”在所谓批林批孔的口号下又进行了新的破坏,国民经济受到了很大损失。一九七五年,毛主席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方针,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的多数同志坚决执行,使得国民经济重新上升。到了一九七六年又受到“四人帮”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名义下进行的一次更加疯狂的破坏。这次破坏超过了历史上历次的破坏，使国民经济达到了崩溃的边缘。

一九七六年十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造成了我们恢复国民经济的根本条件。一九七七年和一九七八年两年中，进行了全国规模的对林彪“四人帮”揭、批、查的政治革命。这个政治

革命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场革命斗争,要在一九七九年实行全党工作中心的转移是不可能的。同时，这两年也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做了很多工作。我们现在需要实行工作着重点的转移，而且已经有了这个条件。基本的条件是因为我们对林彪、“四人帮”揭、批、查的斗争已取得全国范围的基本胜利。这表现在六个方面：①查清了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粉碎了“四人帮”的帮派体系；②联系实际,批判了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及其反动思想体系，从根本上分清了路线是非；③整顿了各级领导班子,清除了那些参与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骨干分子；④对林彪、“四人帮”迫害所造成的大批冤案、错案的平反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⑤恢复和发扬了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⑥实现了安定团结，加强了组织性和纪律性。因为有了揭批林彪、“四人帮”斗争的根本胜利,在一九七九年实现这个转变是完全可能的，同时也是完全必要的。

我们现在把工作中心转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实现四个现代化方面来，同以前时期比较起来，我们现在的物质基础更加强大，国内、国际的条件更加有利,但更重要的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对要实现这个转变的思想认识更加统一,更加明确,更加清醒。大家都承认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是革命斗争的根本目的、根本任务。如果不把工作中心转移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方面来，我们就不可能完成革命的根本任务，不可能达到革命的根本目的和根本要求。那末，我们就对不起为革命牺牲的无数先烈,对不起全国人民,也对不起子孙后代。

革命就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要靠经济建设才能实现的,离开了经济建设就谈不到实现社会主义、共产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主义。林彪“四人帮”一伙人曾经在很长时间里散布了大量的反马克思主义谬论,冒充马克思主义,批判什么所谓“唯生产力论”。这种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就是企图篡改革命的任务,企图使我们中国革命半途而废,是他们在假革命的口号下使国民经济陷于瘫痪、失败的罪恶阴谋。历史的发展根本上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在生产中间结成了相互关系,形成了一定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关系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开始是相适应的,然后逐渐发生各种各样的不相适应的状况。人类社会分裂成为阶级,阶级和阶级之间发生斗争,这是生产力的发展的特定阶段上的现象。只要有人类的历史,就有生产发展的历史。生产的规律,决定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不能认为阶级斗争比之于生产、生产力的发展是更为根本的东西。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发展,哪一个是根本的东西?马克思主义者的回答是,生产力的发展才是更为根本的东西。所以马克思说,发现阶级斗争并不是他的功劳,资产阶级的学者早已讲了这个问题,他的贡献首先就是说明阶级斗争是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的。阶级斗争只是人类生产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发展中间的一个特定阶段的现象。问题非常清楚,决不能把阶级斗争看做是比生产力的发展更为根本的动力。如果是这样,在阶级出现以前以及阶级消灭以后人类社会又是怎样发展呢?那个时候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是没有动力了吗?当然不能这样讲。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阶级,在阶级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到一定阶段发展成为冲突,形成革命,产生新的生产关系,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生产力又得到新的更高的发展。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根据这种观点,社会主义要取代资本主义,当然是为着要比资本主义生

产发展得更快、更好、更合理。毛主席曾把它概括为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怎么能把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污蔑为“唯生产力论”而进行批判呢？如果一定要说这是“唯生产力论”，那么，这种“唯生产力论”就是正确的。那些批判“唯生产力论”的人，根本不曾也不能解释历史唯物主义是怎样说明生产力的发展，怎样形成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在怎样的条件下才会形成革命。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残留，由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期各种制度的不严密、不成熟，还是有阶级、阶级斗争，这是资本主义历史时期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一种遗留。毛主席说，社会主义社会还有阶级、阶级斗争。但是林彪、“四人帮”一伙，在这个地方进行了极大的伪造，在“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前面加上了“始终”两个字。这样，就把原来的在一定历史时期的一个正确的命题篡改成为一个错误的命题，篡改成为荒谬的、自相矛盾的命题。大家都知道，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可是又说社会主义始终存在阶级，把这两个命题合在一起，它的结论就是说社会主义始终不是社会主义。如果说社会主义始终都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那末它又怎样向共产主义过渡？林彪、“四人帮”及其合作者、同谋者在思想理论方面造成的极大混乱，是他们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而制造的所谓理论根据。当然，还不止这些，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反革命谬论。

通过对林彪、“四人帮”的政治上以及思想、理论上的罪恶的揭发、批判，我们党现在终于认识清楚了，革命是手段，社会主义建设是我们的目的。更进一步来说，根本的目的是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的提高，从这个根本目的来说，建设也是手段。革命斗争是手段，各种各样形式的阶级斗争，对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来说

都是手段，目的是建设和实现社会主义一直到过渡到共产主义。我们通过对于林彪“四人帮”一伙所散布的反革命谬论的批判，我们全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意义以及它同整个革命斗争的关系的认识就更加清楚，全党的思想更加统一了。我们讲三大革命一起抓，在这次会议公报上加上了一句话，以生产斗争为中心。

阶级斗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还是存在的。否认、忽略这一点是错误的。我们和林彪“四人帮”就是一场阶级斗争。在粉碎了林彪、“四人帮”以后，像过去十来年给我们党造成这么大损失，发生这么大规模的反革命事件是否还会出现呢？是不会了。因为林彪“四人帮”作为一种阶级斗争的现象，发展成这样的规模，这是一种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特殊现象，产生这种特殊现象的条件已经一去不返，因此像林彪“四人帮”这种大规模的反革命事件不会再重新产生。但是，公报中说，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革命分子还是有，还要跟他们进行阶级斗争，要对他们实行专政。这就是说阶级斗争是存在的，但是不允许任意扩大阶级斗争的范围。

现在，我们社会上除了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以外，还有一些什么专政对象？我们过去常常讲地、富、反、坏、右。右派分子是一个历史现象。这个现象已过去了，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三中全会上基本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中说，地主、富农绝大部分经过多年的劳动改造，已经改造成为守法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因此对于这些人要一律摘掉他们的帽子，他们今后都是人民公社的社员，享有中国公民的全部政治权利。至于地富子女，他们有些从来没做过地、富，有些即使做过也是很短一段时间，这些人当然就是社员，一

般地说,他们本来不发生劳动改造的问题,对他们更加不允许有任何的政治歧视。至于地、富的孙子一辈,他们生下来就是农民,就是社员,但由于过去历史习惯的影响,我们让他们还拖着尾巴,说他们的家庭出身是地、富,这是错误的,他们的家庭出身也是社员。当然,个别没有改造好的地、富也还是有,但是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已经不存在了。对阶级斗争,今后我们还是要密切注意,新的反革命分子、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的分子、新生资产阶级分子还会出现,我们一定要保持警惕,一定要和他们做斗争。在党内也还会有这样那样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对这种影响我们也还要按事件本来面目进行批评、斗争,不夸大,也不缩小。人民内部矛盾,应当坚决按照处理内部矛盾的方法去处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毛主席所作的讲演,经过历史考验,证明它是客观真理。在这一伟大著作发表以后的二十多年中间，可惜我们党内常常没有按照毛主席提出的这一原理来做，以后要坚决按照这一原理来处理人民内部的各种问题。这次会上决定关于‘双打’(即打击‘四人帮’残余势力,打击反革命分子)问题,由各地按实际情况进行，不进行全国性的运动。整党整风也要按照各地具体的情况和风细雨地进行,也不进行全国的运动。过去的经验证明,这种全国性的政治运动经常成为妨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既然要以生产斗争为中心，那么阶级斗争也要以生产斗争为中心。阶级斗争是为着生产斗争利益的需要而进行的，不是为阶级斗争本身来进行的，因为阶级斗争本身不能成为目的。共产主义者从来不以阶级斗争本身作为他们的目的。既然全国人民当前的中心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那么,除非发生外部敌人大规模

侵犯我们国家的事实，我们就一直要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下去，把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发展下去。我们说要在二十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那么到二十一世纪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就完成了、就终结了吗？没有这样的事。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我们提出在二十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也清醒地知道，这还不是很高水平的现代化。要按人口平均计算，按劳动生产率计算，到二十世纪末我们还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这不是二十年、三十年所能解决的问题，还需要继续进行长期的斗争。这个斗争要继续到什么时候？只要不发生战争，那么我们就一直要进行到实现共产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是暂时的任务，是共产主义者也是全国人民根本的长远的任务。实现这个工作着重点的转移，这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尽管我们说在建国一开始，党曾多次提出并实行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方针，但是在过去二十年中，这个转移没有完成，中间受到各种各样的挫折、干扰、破坏。现在我们要下定决心，贯彻始终，来进行这个转变。这个转变，不是普通性质的转变，而是历史性的转变。

二、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总结了我们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在这两个会议上，大家一致认为 社会主义经济要持久地、高速度地、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必须有这样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一）必要的社会政治安定 ；（二）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

所谓必要的社会政治安定，并不是说，是一潭死水，没有任何矛盾、任何变化、任何斗争。如果那样设想，那是幻想、虚构，因为这不合乎客观规律，不是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社会要发展，要进步，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矛盾、斗争。但无论这样那样的矛盾、斗争，都不应该妨碍必要的社会政治安定。这是不是自相矛盾呢？

不是的。我们的历史证明这是不矛盾的。如建国初期到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也就是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六年，中间进行了很多的斗争和政治运动。那时，开展全国性的政治运动是完全必要的，并没有妨碍社会政治安定，生产不但没有下降，而且发展很快。我们进行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进行了 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还进行了作为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前奏的三反、五反运动。这些是完全适合历史虚要的，生产力并没有受到破坏，而且保持了基本的社会政治安定。这同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中间的情况完全不同。林彪“ 四人帮 ”窄“ 文化大革命 ”中所进行的各种各样的反革命的倒行逆施，从这一点也可以证明是违反历史发展方向的。过去进行那么大的阶级斗争，真正打倒了一个又一个阶级，社会是基本安定的,生产是前进的。林彪“ 四人帮 ”及其一伙所实行的那种所谓反对“ 唯生产力论 ”、反对“ 基础论 ”等等假马克思主义的反革命谬论指导下进行的所谓革命，完全是反革命。它破坏了生产，破坏了整个社会政治安定。毛主席为什么几次讲“ 还是安定团结为好 ”？可见毛主席已看到不定定团结就不好，再不能那样继续下去了。没有安定团结，经济搞不上去，我们国家就要一天天陷于危险状态。所以,这两次会议认为 工业也好,农业也好,要发展,一定要有必要的社会政治安定。

要保持必要的社会政治安定，就要防止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以免造成阶级斗争本身的混乱，造成阶级和阶级关系的混乱，阶级内部的混乱。不能随心所欲地，不是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进行这样那样的政治运动、阶级斗争。这并不是说，阶级斗争本身有什么好或不好，这是客观历史现象。有各种各样的阶级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斗争 有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有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本身无所谓好，无所谓不好。要看是什么阶级,按什么目的发动的,目标对着谁的,这个斗争的基础是什么，经济基础是什么，历史基础是什么？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不是为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不是为了排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而进行的阶级斗争，必然适得其反，因为这违反了历史的需要。这样的阶级斗争当然要造成社会政治的极大的不安定。这十多年的历史,同一九五六年前七年的历史比较,可以很清楚地看出 什么样的阶级斗争是正确的，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是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什么样的阶级斗争或所谓的阶级斗争是违反历史前进方向的,是违反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的,不是排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而是制造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它本身就是障碍。这样的阶级斗争必然要造成社会政治的不安定。这同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六年进行的各次政治运动的历史效果、社会政治的效果完全相反。这个历史对比非常明显。这里容不得任何的诡辩，也不需要长篇大论的说明,就可以看出事实的真相。大家认为,为了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要实现工作中心的转移,使社会生产力有个大的发展,实现四个现代化,就一定要有必要的社会政治安定。这是我们党花了很大代价所得来的经验教训。

正确处理好党内是非关系，也非常重要。不能把党内是非斗争轻易提成为路线斗争。在一定时期,我们用了“ 路线斗争 ”这个概念，正确表达了那个事物的实质。可是当这个名词被滥用的时候,这个名词的含义就变得不清楚了。不做分析,不加区别,对什么问题一律搞所谓路线斗争,就使党内生活长期处于不稳定、不正常状态。我们说要实行“ 三不主义 ”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

子。最大的辫子、帽子、棍子，不就是林彪“四人帮”所谓的“路线斗争”吗？按照他们的旨意去进行“路线斗争”，是非界限混淆了，以至于是变成非，非变成是了。按照他们的说法：错误路线，一切都错；反过来说，正确路线，一切都对。这种说法和做法，这种用语造成的习惯，使党内各方面、同志之间的相互关系，不但造成很大的不安定、不团结，而且造成很大的紧张和不正常。

我们不是要混淆是非界限，是非界限不应该混淆。但当我们要分清是非界限的时候，被他们的“路线斗争”一干扰，就常常不是有助于弄清是非问题，而是造成一种气氛，不是实事求是地讨论是非问题，以至把人民内部矛盾的敌我矛盾的界限也混淆了，搞不清楚了。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为彭德怀同志恢复了名誉。他是在林彪“四人帮”迫害下逝世的。他逝世时，情况很悲惨。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同时，不也是同滥用路线斗争概念相关的吗？这还不足以说明，任意用路线斗争概念，对党内生活没有什么好处，反而有很大的坏处吗？今后，党内还会有思想斗争，但是不能把任何思想斗争都说成是路线斗争。正如刚才说的，不要把阶级斗争滥用、扩大一样，党内路线斗争也不要任意滥用、扩大。否则，党内就会不安定、不团结。党内不能安定、不能团结，社会也就不能安定、不能团结。所以，当我们说哪个单位的“路线斗争盖子未揭开”的时候，最好事先多想想用语是否准确，是否合乎实际，如果不准确，就不要用危言耸听的语言。这极不利于党内党外的安定团结，也不利于把是非弄清楚。任何事物都有一定的分寸，超过一定的分寸，同其他事物之间的界限就模糊了。不正确的用语使有关事物得不到正确的认识。我们

无论对现状,或是对历史,最好通过学习三中全会文件,由此得到帮助,养成在政治生活中严格使用概念、术语,使之能够如实反映事物本来面貌的习惯。

其次,就是要遵守客观的经济规律。既然叫做经济规律,就是客观的,本来没有什么主观的规律,主观的东西不能成为规律。我们曾经有过相当高速度的、稳定持久的、有计划的发展,也曾经有过一些失误。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建设社会主义,确实没有经验。一九五六年前有了一些经验,为什么后来反而没有经验了?这要作历史的分析。一九五六年前,在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同时,还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还不是占绝对优势,农业还主要是小农经济,工商业中资本主义工商业还占相当大的比重。因此,要分出很大一部分精力去搞改造。另一方面,还没有学会领导全国范围内的经济建设。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全国范围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确实还缺少经验。所以,在工作中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同志们应看到这是可以理解、可以谅解的。问题是在工作中已发现了错误,进行了纠正,但是未能把所得的结论作为以后指导工作的基础。所以,公报说,工作指导上有错误。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确实是很复杂的事。一九五六年前,发展较快,当时规模较小。现在条件好了,可是面临的困难并不比当时少。除了林彪"四人帮"长期破坏遗留的后果这个因素以外,还有另一方面,究竟如何有效地领导全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仍然包含很多复杂的需要探讨的问题。公报讲毛主席在一九五六年所作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到现在还保持着它的重要的指导作用。这是因为,《论十大关系》中提出来的绝大部分问题现在还是存在的,还需要按当时提出的基本方针,在新的条

件下加以解决。这里面，最根本的还是两方面，就是要保持必要的社会政治安定，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像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党与非党关系，以至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正确地处理这些关系，就能有必要的社会政治安定。在这个报告中提出的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沿海和内地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仍然是我们现在所必须正确处理的重要关系。这些关系是否处理好，就决定于我们是否掌握了客观经济规律。

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就经济体制、管理经济的方法、农业政策等方面作了详细的讨论，现在因为限于时间，不能多谈了。会议着重讨论了农业政策，一些长时间争论不清的问题，在会上得到了解决。我们曾有一个口号叫“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这两句话是很好的话，内容很好，语言也很好，是“格言诗”。但有了这两句很好的话，不等于把实际问题讲清楚了。就像“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名词也可以很好，但如使用时没弄清它的界限，就不能成为有助于我们前进的武器。这两句话也有这个问题。什么叫堵住资本主义的路？什么叫资本主义？应该把它弄清楚。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农村有没有自发资本主义势力？当然有，决不能说没有。但是，从一九五六年到现在，二十多年的历史，经过各种各样长期、艰苦、曲折、复杂的斗争，也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农民拥护社会主义，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是极少数。绝大部分原来的地主富农经过劳动改造已经走了社会主义道路，并不像电影里表现的那样，都在搞资本主义。什么叫搞资本主义？把副业，甚至是正业，除了种粮食以外，搞了其他经济作物，没有按当地的规定去种植，都叫做“资本主义”，行吗？有这样的资本主义

吗？副业经营是社会主义本身的组成部分，还不是补充部分。小量自留地、家庭副业，是国家宪法上规定的，党的正式文件所肯定的，也叫资本主义？所以，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倾向是有的，但不能描写成为到处都是，以至为了堵所谓资本主义的路，把所有的门路都堵起来，只留一个门。像我们这个会场，有几千人在开会，能只留一个门吗？一旦发生意外出得去吗？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首先要分清。社会主义经济的分配原则，也曾被许多地方在很长时间内认为是资本主义原则。如不把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界限分清楚，那么，农业经济就很难发展。

当前问题很多。要高速度地发展工业经济、农业经济，会受到许多限制。中央已经进行了很大努力，采取许多重大的步骤，可以保证我们的经济以过去所没有的规模和速度向前发展。但在前进道路上有很多困难。由于林彪、“四人帮”长期破坏造成的后果，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严重，不是短时间所能解决的。这两次会议考虑到多年存在的工业品价格过高、农产品价格过低，解放以来虽有过多次调整，但幅度都还不大，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受到挫伤，所以作了决定，坚决调整农产品和农用工业品价格。公报已经说清楚了。但是工农业产品比价问题还不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完全解决。工业部门也存在许多不平衡的现象。应当承认，近几年内，在前进的道路上，还存在着许多困难和问题，不是全党工作着重点一转移就都能马上解决。我们要大力发展进出口贸易，可以利用外国贷款，采取其他一些国际流行的方式。要发展进出口贸易就需要把港口大大扩大，但不是很短时间能够实现的。交通运输有很多薄弱的地方。电力还有很大缺口。这些都造成一系列矛盾。多年积累下来的人民生活问题，是大家所关心的。农业方面提高粮价的

问题，限制征购数量的问题，落后地区援助的问题，广大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安置的问题，城市里待业人口安排就业的问题，都需要一个个解决。基本建设中只有“骨头”没有“肉”的问题，就是办了工厂没有一些必要的配套设施——生活设施、交通设施、商业设施。城市居民住房严重困难。我们社会科学院除极少数同志外，都有住房困难的问题。城市很大一部分低工资的职工，工资需要调整。其他如环境污染、卫生、教育、科学，问题非常多，无论小学教育、中学教育、高等教育都存在着大量亟待解决的困难。所有这些问题都要解决，都很迫切，有些问题简直一天都不能等待。为着解决这些问题，国家不得不对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相互关系问题作适当安排。这就是说：我们决不能不管人民生活问题，而专门去搞经济建设。如果不管这些问题，经济建设就发展不起来。但能否短期都解决？同志们知道，这确是很困难的。中央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一步一步地解决。不是用“逐步解决”的空话来搪塞，而是切实动手一个一个地解决。我们应当对国家的形势有全面了解。人民和政府之间需要互相谅解，才能使国家一步步前进，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都会比较快的。总之，解决了两个根本前提：一定要有必要的社会政治安定（长期的安定），一定要真正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也是长期的，无论何时，只要存在经济活动，就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这些政策都是长期的，只要这样，经济建设一定是会顺利发展的。

生产关系、上层建筑需要围绕生产力的发展进行适当改革。会议讨论了这方面的问题，决定了三条：

（一）对物质利益，大家认定：生产关系就是物质利益的关系，不能离开物质利益谈生产关系。分配上，物质鼓励应当与精神鼓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